

王安忆之父:南洋归雁的传奇(1)

上海作家王安忆的父亲王嘯平先生(1919—2003),出生于新加坡,早年在南洋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从事进步演剧和文艺创作。1940年返回祖国,赴苏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政治剧院戏剧部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副团长、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副团长、江苏电影制片厂编导、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等职。《世纪》今年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组文章,系王嘯平先生生前留下的回忆文字,原题《南来北归雁》。读者从王嘯平先生暮年回首中可窥见一位对祖国充满赤诚之心而毅然回国投身革命事业的归国华侨终生不渝的理想与激情。本版摘录其中两篇和王安忆特为此组文章撰写的小跋。

爱的折磨与荣耀

王嘯平

我在童年时,便知道我有一位妹妹送给远房亲戚,那是经常听到父母和老祖母唠叨着的。他们是忘不了这位远离身边的亲骨肉。我对这位妹妹却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特别二十一岁那年,漂洋过海回国参加抗战,更是把她全忘了。祖国改革开放以来,流落在海外的三亲六戚,故交老友,有了音信,有了联系。我这位妹妹已进了老年行列,儿女成群。年轻人比母辈怀念我这位年轻即回国的老舅舅,经常给我写信问安,也使我了解他们一些情况。其中大外甥,获得美国艾奥瓦大学博士学位,现在台湾某大学当教授。据说模样长得像我。1998年秋,我女儿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终于见到这位大表哥。据说她不仅模样长得像我,性格也相似。除了专注他的专业外,似乎不闻人间烟火,从不沾手柴米油盐,如我除了能泡方便面外,连烧饭也外行,而且,也跟我一样,从小就有点耳聋。

从外甥们口中知道这位妹妹为何不给我回信或回国来看我,因她在我面前有自卑感,她当年被父母认为是“祸根”抛弃的,虽然收养她的人家是情谊深厚的亲戚,待她如亲生儿女,非常疼爱。她也嫁了好丈夫,儿女成群,



■ 1950年王嘯平与茹志鹃结婚照

家境也富裕幸福,但对自己身世耿耿于怀。

为什么父母把她当成“祸根”呢?

我父亲是我年轻守寡祖母的独生子,父亲成家后生下我这个宝贝,真是老天爷的恩赐,是传宗接代的老祖宗,所以要我叫父亲为“叔”,叫母亲为“婶”,因我是老天爷恩赐的小神仙,这人间是没有人有资格当我的老子和老娘的。我这天王小老子降生隔年,这位妹妹便诞生了,她一生下来,父亲便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是倾家荡产又债台高筑才把他一条老命从阎王手里夺回来。这都是这该死女儿带来的。祸根不除,家无宁日。因此只好忍痛送小瘟神。

罗曼·罗兰说过,“一颗充满爱的心,是天生要受它们的爱的人的折磨的”。

留给祖母、父母终其一生的痛苦、不幸、折磨的,并非他们送走的女儿,而是我这个他们最疼爱、最宝贵的天王小老子。我说终其一生,因为他们整整四十年,不知我在天涯何方,海角何地?不知我是活在人间或是早埋在荒山野地,日日夜夜无尽的悲伤,焦虑的折磨。直到近半世纪后,幸逢祖国改革开放之后,我回去探亲时,他们早已长眠地下,据说八十三岁老祖母弥留之际,还叨念着我这个孩子。

在这世界上,最神圣、最无私的爱,是母爱。我十三岁时,家庭经济已落入困境,父亲经商失败,又吸上了鸦片,母亲也四十出头,

她生了十个儿女,夭折的,送人的,最后只剩下我的弟弟及一个妹妹。当时还有个老祖母,全家十几口人三顿饭,劈柴洗菜洗碗,以及全家衣服都靠她一人洗。全家用完餐,留下剩饭残羹,她才上桌,这匆匆用餐时,可说是一天中唯一屁股坐在板凳歇口气的瞬间。我长成年时,需要出门谋生,但我找不到职业,感到没有前途,非常苦闷,她安慰我说:“只要你留在我身边,我要饭也要养活你。”她最担心的是我远走高飞,“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在那个时代南洋青年是感到可笑,没有出息的。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伏尔加流浪汉的“高尔基”,回祖国上前线奔西安,入抗大陕北公学,才是他们认为超尘脱俗、鹤立鸡群的高尚生活,壮丽人生。我也终于离家出走了。

而且,母亲也知道,我并非到什么地方谋生,也不是去哪里探亲访友,也非到远地去观光旅游,而是到炮火连天的祖国战地,这是生离,也可能是死别。

1989年我回到新加坡探亲,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松年博士来访我,说他在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后各种当地华文报刊全毁的劫后余生中,找到我1937-1940中所发表的各种文章近四十篇,这些文章作者虽然是我,但现在也是他艰苦考证的成果,所以目前都未影印给我。其中所写内容,人事变迁半世纪,我都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但其中一篇短文叫《离家前夜》,我却历历在目:母亲满脸泪容,全身瘫痪似地坐在椅子上,全家笼罩着阴郁的沉重气氛中,连平时俏皮捣蛋、整天蹦蹦跳跳,屁股片刻都不沾板凳的九岁小弟弟,也感到家中发生了什么灾难,乖乖地、安静地坐在一旁。我为了别后避免引起母亲触景生情,把书架的书都送到剧社,把墙上我的一帧美术大半身照片也摘下来送给好友吴静邦,这照片直到全国解放后,吴先生回到故乡厦门后又寄还给我。

我投奔新四军后,驰骋山沟平原穷山野岭,根本不可能与海外家庭通信,全家都极焦虑,悬念着杳无音讯的游子。我十一月投军,隔

年二月发生皖南事变,新加坡有报纸新闻说我已殉难,全家悲痛欲绝。上海朋友急托人转告我家里,说我不是到皖南,而是到苏北。我到苏北不到一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日本侵略者秋季大规模扫荡,我哮喘病又发作,领导便“精简”我回上海养病。我到上海人生地疏,原寄存友人的衣服用品全部被分光失落,身上又没生活费,冬天又将至,面临冻饿死的威胁,便急函寄家中求救,家中接到我流落异乡可能饿死街头的求救信,刚要回信,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从上海到新加坡航线断绝,我又像断了线的风筝,全家又陷入为我生死未卜的焦虑、悲痛的情绪里。近五年后,日本投降,我早已回部队并驻扎在苏中解放区东台市,生活暂为安定,才给家中寄去平安信,家中回信我尚未接到,蒋介石大举进攻华中解放区,我又跟着部队退出华中解放区,北上山东……全国解放后,才能经常和家庭联系,老祖母等不及我这宝贝孙子归来,含悲仙逝,父母也已风烛残年,家境又更贫寒,不可能回来看我。我曾筹军饷寄给他们表示孝心,但当时尚未改革开放,严禁汇款到国外……

我这家庭天王小老子才是给母亲带来无穷尽不幸的“瘟神”。

到了晚年,回首一生,整整离家革命六十年,作为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虽然也为党与人民做了点有益工作,但甚愧为贡献太微薄,可欣慰的,是从未做过损害党的坏事,一生廉洁自律,我敢说连根烟也不抽公家的。我当官时,为联系关系与兄弟领导应酬,宴请也不用公款,是自己掏腰包,更不为亲人、为自己极力谋私利。1957年划我为“右派”,剧团全体大会批评我四天,说我有各种错误文艺思想,但没有任何为己谋私,争权索利。当我有时看看几个战役纪念章,两个三级军勋章(独立勋章、解放勋章),我常常这样想,这里也有为我悲痛终生的母亲和家中亲人一部分心血。

这也是我自感到对得起母亲的欣慰。

母亲,您是备受爱的折磨,但在天之灵,您也有一份爱的荣耀。

母亲邵华

毛新宇



10.将两颗孤独的心拉近了

上海—香港—北平—南昌。外婆与吴照高手换着手,刚出虎穴,又进狼窝,不停地转换身份,频繁地转移住址,圆满完成了一次次惊险奇特的任务,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国际红色情报战士。之后,她又打入英美烟厂,以英美烟厂小学教师的公开身份搜集情报。

共产国际在远东地区的情报机构撤销后,外婆又与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李耀晶结成假夫妻,开展工作。时间不长,李耀晶因被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外婆又一次以妻子的身份掩埋了一个“丈夫”,以一个媳妇的身份回到宿迁,为“公公婆婆”献上应有的孝心。

“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既是我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成了外婆的口头禅和人生座右铭。“前方战友在流血牺牲,自己在后方吃点苦头算不了什么。”外婆在心里默默地鼓励着自己。后来,她又去给资本家的姨太太当家庭教师,在平民教育院当国文老师,在女子公寓当会计,用这些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1936年,外婆又接受了刘仲华领导的南方情报部的工作,担任北方站站长。

1937年9月底的一天,外婆刚从北平送情报回来,刘仲华高兴地告诉她,组织决定派她去延安接受新的任务……有绿千里来相会。外婆带着思齐姨妈来到西安,住进了八路军办事处。那时,这里住着从全国各地赶来欲奔赴延安的进步人士和革命者。一天,外婆带着姨妈去食堂打饭,看见林伯渠正在与一个穿着便衣拄着双拐的人说话。外婆本无意打搅,可林老看见外婆,热情地招呼她:“过来吧,张文秋,认识一下,这是红三军的陈振亚同志。”

外婆便主动上前和那位同志握手问好,也教思齐姨妈问候叔叔。

“陈振亚同志参加过平江起义,上过井冈山,跟随彭老总、毛主席打过仗,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为革命截了一条腿,是革命功臣啊!”林伯渠介绍了外公,又转过头向外公介绍外婆:“张文秋同志也是老革命了,当年也是威

风凛凛的暴动队长,后来一直在中央做秘密工作。她是刚从上海赶来的,过几天与你一块儿去延安。”

此刻,他俩的目光都落在了对方脸上,彼此瞬间多了一层敬慕——外公浓眉大眼,清瘦中透出刚毅;而外婆秀眉端庄,身着旗袍,优雅入时。这年,他们两人都是三十四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地区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行色匆匆地来到七贤庄,礼节性地与外公、外婆见了短暂一面,便搭乘阎锡山派来的专列小火车向太原进发。而八路军办事处大部分人员也因忙于要务,实在派出前往延安的车辆,所以我外公陈振亚和外婆仍然滞留在西安,他们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交流,外婆也主动担当起了照顾外公的任务。

外公快人快语,满肚子奇闻趣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让外婆大开眼界,羡慕不已,而外婆见多识广,乐观豁达,讲起党和地下工作也是一波三折,悬念横生,也令外公心驰神往。一个湖北,一个湖南,语言和风俗习惯相近,而共同的革命事业和人生理想,又使两人产生了一种天伦的亲近感。外婆因长期做秘密工作不得不处处慎言慎行,现在却再也不用隔墙有耳,不怕特务盯梢了,完全可以打开窗子说亮话了!在与外公交谈时,她一会儿心伤得满脸泪水,一会儿又高兴得满脸笑意。

西安承载了中华民族早期曾经的繁荣和辉煌,名胜古迹遍布城郊。林伯渠建议他们出去游览,也顺便了解下民情民意。那些日子,外公和外婆,带着思齐姨妈,一起参观了碑林、钟楼、大雁塔、灞桥等古迹,他们玩得非常愉快,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将两颗孤独的心拉近了。

1937年8月底,八路军办事处终于调来了三辆大卡车,送人们去延安。出发前,林伯渠安排外婆和外公同乘一辆车。因外公行走不便,坐在驾驶室,外婆和思齐姨妈上了大车厢。

时过晌午,车队顺利抵达黄陵县。

黄陵县位于西安和延安的中间地带,这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黄帝的万福之地。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爷爷毛泽东亲笔撰写了气壮山河的《祭黄帝陵文》。

39.袁朴生要回家了

第二天,三岛雄夫送来了袁朴生回国的船票。把船票攥在手心里,袁朴生胸口热热地突然有些堵。他知道,三岛雄夫希望他快点走,否则,他会改变主意。因为,那把长刀已经从墙上取下来了。那天以后,三岛雄夫曾经说,师傅,如果我真想杀你却杀不了你,那我就会自杀。突然发现,这些日子里,三岛雄夫瘦了,眼袋明显胀大,头发也掉得厉害,头顶已有点微秃了。

三岛君,你也要保重身体啊。三岛雄夫叹气道:谢谢师傅!师傅是不是有点留恋这里,还要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呢?不!袁朴生说,有些事情,你我就心照不宣了吧。我不走,三岛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安稳。三岛雄夫脸色黯淡地说:师傅不要说了。袁朴生安慰他说,你有鲤江高寿,他会帮你实现理想。在你们日本的陶瓷历史上,鲤江高寿将是一个传世的人物。三岛雄夫黯淡的眼睛里生出些许光亮:谢谢师傅!

这天吃饭的时候,袁朴生发现美智子和惠子不见了。他想问。但他忍住了。倒是三岛雄夫忍不住了,说,师傅,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你不说出来呢?袁朴生放下筷子,说,人,皆有各自的归宿。任何事情,在袁某这里都是可以看开的。三岛雄夫冷笑道:你们清国人就是这样,口是心非,言不由衷!袁朴生突然一点胃口也没有了。站起来拂袖而去。

过后,三岛雄夫还是来找他了,告诉他,美智子已经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他曾经答应,会给她自由的;现在他已经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袁朴生听着,心里一阵说不出的滋味。问,那么,惠子呢?三岛雄夫说,衫门昂立参加了海军,他从军前提出,要跟惠子订婚,惠子答应了。这几天她和衫门昂立在一起。

她答应了?是你答应了!因为衫门家族是武士,你不敢得罪他们,你知道惠子并不爱衫门昂立!袁朴生说着,嗓门渐渐大起来。

如果师傅敢把惠子带回清国,那我就敢抵抗衫门家族的求婚。可是师傅,你有这个勇气吗?这一点,我很不佩服你!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在清国有女人。这一点你是清楚的。我

袁某人一没有勾引你的老婆,二没有糟蹋你的妹妹。平心而论,我内心的确喜欢她们,她们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女人,可是,那是你们日本的女人,我袁某人没有福气消受。

三岛雄夫说不出话了。梅樱急需被打碎的那个夜晚,鲤江高寿奉了他的命令,其实就在门口守着,客厅里发生的一切都被他看到了。在鲤江高寿后来的叙述里,把袁朴生说成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袁师傅没有性欲,或者存在着严重的生理缺陷?当时惠子恨不得要把自己的衣服扒下来,可是袁师傅坚持不让。他只是像大哥那样拥抱了她,理顺了她额上的头发。然后,亲了亲她的额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男女之情?那个晚上完全应该有性爱的情节,可是鲤江高寿没有等到。他又分析说,是不是袁师傅在清国有相爱的女人?袁师傅可真是纯情啊。

袁朴生离开三岛家的那天下起了雨。他去向老三岛夫妇辞行。老三岛神情持重地告诉他一句话:从此以后,清国再也不是日本的师傅了。

袁朴生说:60年风水轮流转。等着吧!

鲤江高寿带来了一套用戏用的假发和假胡须,还有一套玄色的和服。袁朴生不解,鲤江高寿吞吞吐吐地说,前几天在长崎,有个清国人被打。我怕师傅出门会吃亏!那些黑龙会的人,见到清国人就舞刀弄棒的!袁朴生怒不可遏,老子倒不相信,哪个东洋赤佬敢碰我!

三岛雄夫送给袁朴生的礼物是一块紫檀木的匾额,上面镌刻着“壶王”两个大字。匾额的下方刻着一行小字:远涉东瀛、传授壶艺、德清品懿、永世流芳。常滑窑三岛家族躬立。明治27年9月。

这块匾额的分量太重了,袁朴生有些扛不起。内心升起惶恐,言辞便变得笨拙。反复地说:袁某如何敢当?之后,心里却慢慢地一阵舒坦。好多天了,一直憋屈着,一团浊气在胸中久久不能散发。此刻他一点也不恨三岛雄夫了。苍天在上,他袁朴生问心无愧!过去发生的一切,终于过去了。他袁朴生要回家了。

想来想去,把自己多年随身带着泡茶的那把玲珑壶,送给了三岛雄夫。这把壶,你舍不得摔了吧。

国壶

徐风

